

## 二十世紀華文《易》學史書寫概論 ——以先秦《易》學史為討論重點\*

王詩評\*\*

**摘要：**《易》海浩瀚，傳世之《易》學著作繁如星斗，《易》學史的研究與《易》學的繁榮勝景相比，則顯薄弱。因此，本論文擬就目前學界之《易》學史相關著作進行通盤的反思、檢討、考察與比較，並集中討論與省思各著作之書寫問題，以期能提供未來《易》學史撰寫者有益之參考基準，同時拋磚引玉，引發更多關注此議題的學術討論，進而有助於拓展《易》學研究之不同面向。先秦奠基數千年的《易》學風華，另一方面，又開啟後代義理《易》學、象數《易》學的發展，在學術史的發展上，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本論文擬以高懷民、朱伯崑、徐芹庭、廖名春等人之《易》學通史著作為研究範圍，並以先秦為討論焦點，希冀藉由各家論述之比較與省思，對於《易》學史書寫能作全面性、周延性之釐清與認識。

**關鍵詞：**易學史、學術史、史觀、易學、易經

---

\* 收件日期：2024/04/29；修改日期：2024/07/29；接受日期：2024/08/04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A Study of Chinese Writing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anges*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 Discussions before the Qin Dynasty\***

Wang, Shih-ping\*\*

**Abstract:** The sea of *The Changes* is vast and studies of *The Changes* passed down to the world are as numerous as stars, whil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anges* studies appear weak compared with the prosperity of *The Changes* studies.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will reflect on, review, examine, and compare 20th-century Chinese-language work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anges* studies. Its discussion will focus on their writing issue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views, the methodologies, the organization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histories of *The Changes* studies. It hopes to provide future *The Changes* study history writers with a beneficial reference standard and at the same time serve as an initiation for further studies in this direction. In stimulating more academic discussions concerned with this topic, it will contribute to expanding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Changes* studies.

**Keywords:** history of *The Changes* studies, historical view, studies of *The Changes*, The Classic of Changes, *The Changes* of Zhou

---

\* Received: March 29, 2024 ; Sent out for revision: July 29, 2024; Accepted: August, 04, 2024.

\*\*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 一、前言

《易經》乃群經之首、三玄之冠，其博大精深而幽深玄妙的內容，廣涉哲學、史學、文學、數學等領域，在時代的更迭遞嬗中，亦結合其他新學門呈現出豐富而斑斕的面貌。清代四庫館臣對於《周易》的基本定位及整體認識，提出重要的看法，《四庫全書總目·經部一·易類一》：

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故《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於禳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叅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sup>1</sup>

文中明確指出，《易》最初乃寓教於卜筮之典冊，及至後世流行發展，而有「兩派六宗」之分類。「兩派」指義理派和象數派，「六宗」即占卜、禳祥、造化、老莊、儒理、史事。如同《四庫總目》所言，歷史上的兩派六宗為《易》之本質的探討，相互攻訐、啟其論端，但另一方面，亦可見得《易》之內涵蘊藏豐富的意義，足以流變出不同面向

<sup>1</sup> 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頁3。

之詮釋領域。黃俊傑先生認為，經典之所以永恆，是因為歷代詮釋者，懷抱著自身問題進入經典；詮釋者自身的「歷史性」，正是開發出經典潛藏「意涵（meaning）」之重要動力。<sup>2</sup>《周易》歷經千年淘洗，卻仍能於歷史中熠熠生輝，經典解讀者與文本之間永無止盡的創造性對話，賦予《易》日新又新的生命，突破時空洪水之沖刷，重新開啟內部潛藏的豐厚意涵。

上引《四庫提要》之文，概述春秋以降至清代初期《易》學發展的大致輪廓，類似《易》學史的敘述。然以專書形式呈現《易》學史論述者，最早乃日籍作家今東光（1898-1977）於1941年出版之《易學史》<sup>3</sup>，今氏之作稍嫌簡要，且該書內容僅迄於南宋朱熹；戶田豐三郎（1905-1973）《易經注釋史綱》<sup>4</sup>雖論及清代，但以注疏之學為主，取材不免侷限。日人之專書《易》學史著述，或有孤明先發之意義，若論及上世紀《易》學史書寫之代表著作，仍以華人學者為主力。高懷民（1928-）是兩岸首位致力於《易》學史寫作的學者，其《兩漢易學史》<sup>5</sup>發表於1970年，《先秦易學史》<sup>6</sup>、《宋元明易學史》<sup>7</sup>則分別於1975年、1994年問世，持平而論，高氏《易》學史雖有未竟

---

<sup>2</sup> 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收入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臺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年），頁339。

<sup>3</sup> 本文參閱的是昭和41年版本。今東光：《易學史》，東京：紀元書房，1966年。

<sup>4</sup> 本文參閱的是昭和43年版本。戶田豐三郎：《易經注釋史綱》，東京，風間書房，1968年。

<sup>5</sup> 本文參閱的高氏《易》學史著作皆以2007年版本為主。高懷民：《兩漢易學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sup>6</sup> 高懷民：《先秦易學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sup>7</sup> 高懷民：《宋元明易學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之處，然就其《易》學史書寫的方法、觀點及目的，確有獨到之處。<sup>8</sup>徐芹庭（1945-）《易學源流》<sup>9</sup>1987年由國立編譯館發行初版，2008年更名為《易經源流——中國易經學史》<sup>10</sup>，由中國書店發售簡體字版；該書上溯燧人氏畫前之易，下迄民國以來各家學派，資料豐贍，不遜於高著。此外，徐氏另有《易圖源流》<sup>11</sup>（1993）一書，後以《易圖源流——中國易經圖書學史》<sup>12</sup>（2008）之名再版，詳列先秦至民國之卦畫圖象，合參二書，實能掌握數千年來《周易》象數、義理二派發展之脈絡。大陸地區的《易》學史巨作，首推朱伯崑（1923-2007）《易學哲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於1986年至1989年曾出版過該書的上、中兩冊，全書則首次由臺灣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991年分四冊發行。朱氏此作系統論述了先秦至清代的《易》學哲學，異於哲學史與經學史之研究，其開創性獲得高度評價。廖名春（1956-）、康學偉（1958-）、梁韋弦（1953-）合著《周易研究史》<sup>13</sup>（1991），鑒於彼時中國尚無一部完整的《易》學通史，故根據《易》學發展的內在邏輯，從古至今（所用資料至1989年），將《易》學發展歷程分

<sup>8</sup> 筆者碩士論文即以「高懷民教授《易》學研究」為題，關於高氏《易》學史的未竟之處，歸納為以下三點：一、遺珠之憾，未盡搜羅；二、材料不足，不及修改；三、提撥哲理，未能深入。以上詳見王詩評：《高懷民教授《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6月），頁244-245。

<sup>9</sup> 徐芹庭：《易學源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年。

<sup>10</sup> 徐芹庭：《易經源流——中國易經學史》，北京：中國書店，2008年。

<sup>11</sup> 徐芹庭：《易圖源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93年。

<sup>12</sup> 徐芹庭：《易圖源流——中國易經圖書學史》，北京：中國書店，2007年。

<sup>13</sup> 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周易研究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7年。

為先秦、兩漢、魏晉隋唐、明清、現代共六期，以補全前學《易》學史著作未臻完備之闕。以上諸書連貫地敘述各時期《易》學演變歷程，雖未必皆能完整地涵蓋先秦至近現代，因其撰述範圍橫跨多個朝代，故筆者將其歸為《易》學通史。

《周易》為五經之原，相較於其餘諸經，歷史最久、著作最多、研《易》者最眾。然就當前研究成果而言，學者多側重於對《易》學人物的個案研究，或是單一《易》學問題的思考討論，以《易》學史為主題的撰作發展甚遲，作品有限，前學甚喟嘆至今仍未有一部理想的《易》學史著作。<sup>14</sup>當然，一部完整的學術史牽涉內容甚繁，舉凡學術時期之斷代、學術流派之考述、學術人物之收錄、學術思想之析論……等，實為一項浩大的工程。《周易》的符號語言系統及理論思維形式，有其自身的理解深度與獨特體系，若非長期浸淫《易》學且研《易》有成，斷難勝任此學術工程。上世紀「中國文學史」著作與「中國文學史」相關研究，可謂卷帙浩繁、汗牛充棟；「中國學術史」、「中國思想史」之相關著述，亦已蔚為一研究學門。「中國經學史」

---

<sup>14</sup> 黃忠天教授說：「易學向為經學中的顯學，研究者眾，閱讀者廣。惜迄今仍乏一部完備的易學史。此固然與易學史的研究範疇涵蓋甚廣，歷代易學著作過於繁富，其中繁瑣艱深者亦復不少，其撰述難度可想而知。」另外，林忠軍在爬梳近六十年來中國大陸易學研究概況，亦言：「學者們更多側重於對易學人物的個案研究，但能在個案研究基礎上融會貫通，對易學發展、演變歷程作整體把握的研究成果尚不多，遺憾的是大陸至今仍未有一部資料詳細內容豐富的易學史著作。」以上請見黃忠天：〈易學史體例與方法的省思〉，《經學研究集刊》，第19期（2015年11月），頁83。林忠軍：〈近六十年來中國大陸易學研究述評〉，《新北：《哲學與文化》，第42卷第12期，2015年12月），頁30。

之研究雖不若前兩項興盛<sup>15</sup>，然早於清末已發其端<sup>16</sup>，相形之下，「中國《易》學史」之發展則有偌大的進步空間。

誠如前述，一部合於眾人期待、貫徹古今中外的《易》學史著作，實有難度。然若能在前人之基礎上，後出轉精，終必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佳構。是故，若能對現行《易》學史著作進行通盤之反思、檢討、考察、比較，定能提供未來《易》學史撰寫者有益之參考基準，同時亦能掌握當前《易》學史書寫的問題與侷限，有助於研《易》者

<sup>15</sup> 對於經學史之研究不及哲學史和文學史，林慶彰教授指出：「近五十年來的經學史研究所以一蹶不振，主要的原因有下列數點：其一，前人經學史的負面影響。其二，經學內容包含太廣，學者兼顧不易。其三，經學的資料缺乏統一的整理。其四，缺乏新方法的刺激：哲學史和文學史的研究，有西洋哲學史和文學史的研究方法作為借鏡，近數十年來的研究成果也較豐碩。經學是我國特有的學問，並無現成的理論可取資，以致各本經學史的著作皆陳陳相因，讀者自不易引起興趣。」請見林慶彰：〈經學史研究的基本認識〉，（臺北：《國文天地》，第3卷第6期，1987年11月），頁60-61。

<sup>16</sup> 經學史的撰作發展甚早，遠從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劉師培（1884-1919）《經學教科書》已發先聲，其後，皮錫瑞（1850-1908）《經學歷史》、陳燕方《經學源流淺說》、本田成之（1882-1945）《支那經學史概說》、甘鵬雲（1861-1940）《經學源流考》、周予同（1898-1981）《經學歷史注釋》、安井小太郎（1858-1938）《經學史》、瀧熊之助《支那經學史論》、馬宗霍（1897-1976）《中國經學史》、吳雁南（1929-2001）等人《中國經學史》、李威熊（1941-）《中國經學發展史論（上冊）》，加上經學斷代史之相關著述，數量甚夥。此外，早於1991年中央研究院即邀請程元敏教授、宋鼎宗教授、李威熊教授、莊雅州教授等人，就現行幾種《中國經學史》及其相關問題作一檢討。因此，關於經學史撰寫及經學史相關研究之反思，成果雖不若文學史、思想史興盛，亦已奠定相當基礎。請見程元敏、朱鼎宗、李威熊、莊雅州：〈現行經學史及其相關問題〉，（臺北：《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卷第3期，1991年9月），頁125-153。

拓展其關注議題，進而充實《易》學研究之不同面向。

竊以為《易》學「史」應著重《易》學在歷史軌跡上的發展過程，其不同於純粹的《易》學研究，亦非歷史著作。若僅是單純的文獻彙編，例如羅列學者生平、著述、理論、後人評價，則是「靜態」的資料序列，並非「動態」的學術變遷，缺乏「史」之態度與意識。所以，本文欲探索者，乃是作者運用觀點、賦予意義，對整體《易》學史之解。然礙於單篇論文之侷限，故將討論重心置於先秦《易》學史，因其乃《易》學發展之基石，奠定後代《易》學理、象、數、術之發展，並開啟數千年的《易》學研究風采。在段落開展方面，本文擬就目前各《易》學通史之概況，探討其書寫方法與史觀呈現，專就高懷民、朱伯崑、徐芹庭、廖名春等人具代表性之《易》學通史為討論對象，並以先秦為主要範圍，希冀藉由各家論述之比較與省思，提出更周全之見解。

## 二、《易》學史書寫之反思

李威熊教授曾說：「要寫好中國經學史，首先要重視的便是史觀問題。」<sup>17</sup>筆者以為，治《易》學史亦當如是。撰寫者既將「《易》學」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自然就應該思考，應用什麼樣的觀念、方法與尺度來考察、選擇、辨析、描述、評價各種紛紜複雜的《易》學史現象。這些觀念、方法與尺度，綜合起來就是「《易》學史觀」。梁啟超先生（1873-1929）以為，「學術史的任务應是反映各時代有代表性的

---

<sup>17</sup> 李威熊：〈如何編寫一部理想的經學史〉，（臺北：《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卷第3期，1991年9月），頁140。

各種學術發展情況。」<sup>18</sup>事實上，這段話即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何為有「代表性」的學術發展情況？何者又是不具「代表性」的學術發展情況？關於這個問題，牽涉撰寫者對於此門學科的義界、取材範圍、當代意識等，因此，若以「史觀」為「《易》學史」研究之重點，吾人或可言，因為撰寫者融注於各部《易》學史的獨特史觀，使得「《易》學史」不同於拾人牙慧的歷史彙編，反而成為新學科形式的《易》學著作。

筆者欲省察的重點，不只是各《易》學史著作的內容，而是想揭示撰寫者於字裡行間自覺或不自覺地透露出來對《易》學史觀念的設想。<sup>19</sup>所以，不同時代、區域的撰寫者，其筆下《易》學史之當代「史觀」與史學「方法」之探究，尤為本文之核心。以下茲就目前所觀察到之面向，討論影響《易》學史寫作的各項切入點。

---

<sup>18</sup>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1年），頁15。

<sup>19</sup> 歷史學家布萊德雷（Francis Herbert Bradley, 1846-1924）曾提出「歷史學的前提」（the presuppositions of history），英國歷史學家沃爾什（William H. Walsh, 1913-1986）在解釋布萊德雷「歷史學的前提」這一概念時，曾經指出，歷史作為對過去事實的研究，不可能是純客觀的，也不可能是對史料的直接堆積與描述。它必須依據歷史學家對歷史的特定思考與理解。歷史研究當然要立足於史料所提供的歷史事實，但無論史料多麼豐富，它們本身並不能構成系統而完備的歷史知識。最後賦予史料以生命的，或者使史料成為史學的，是歷史學家的思想。因此他把「歷史學的前提」，解釋為「歷史學家的哲學」。他認為，事實上，歷史學家「每個人都以自己的哲學觀點在探索過去」，而「這對他們解說歷史的方式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英·沃爾什（W. H. Walsh）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哲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01-104。

### (一) 寫作體例問題

寫作體例不僅是章節安排之類的純格式問題，也蘊含對研究對象的整體思考和學術取向。作者以「人」為撰寫中心，抑或以「議題」為章節主軸，將呈現完全迥異之書寫樣貌。另外，《易》學通史定會涉及斷代分期的問題，各章節是以朝代更迭作為斷代依據，還是以《易》學發展現象進行分期，又與作者之研究方法密切相關。現有《易》學史體例多以時代序列為主，採編年記事，或分成若干時期，依時間序列介紹《易》學發展情形，其下再舉重要《易》學家之生平、著作、理論、影響，建構不同階段之《易》學發展體系。

實言之，筆者此處尚無意去評價各家《易》學史撰寫體例之高下，乃欲呈顯體例安排是作者書寫意識的表現。例如：高懷民《兩漢易學史》於〈自序〉說明其寫作原則，乃是以學術思想演變為經，以各家《易》說的介紹為緯。因作者以象數《易》為漢代《易》學主流，所以敘述象數《易》特詳，儒門《易》則從簡。該書以「兩漢」為名，所收之《易》學人物卻囊括魏晉，高氏解釋曰：

本書中所述部分《易》家，如管輅、王弼、蜀才、干寶數人，論時代已在東漢以後，但從學術上說，此數人都應納入漢《易》範圍：管輅《易》為焦、京一脈的嫡傳；蜀才《易》採虞翻卦變為說；王弼排除象數，為漢《易》時代的結束；至於干寶，雖已晚至晉元之世，但其注《易》以孟、京《易》為宗而有新創義，略掉可惜，故也附載於注經派象數《易》家之後，可視為漢象數《易》的落日餘暉。<sup>20</sup>

---

<sup>20</sup>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頁 1-2。

由此可知，高氏並非以人物為斷代依據，乃是以漢代象數《易》學之發展為此時期的書寫主軸，參看該書章節標題：漢《易》中幾個特殊問題、漢興儒門《易》的復古、漢象數《易》興起的原因、前期占驗派象數《易》家、後期注經派象數《易》家、漢象數《易》的結束、兩漢《易》學綜述，作者企圖對漢《易》的整體形勢進行說明，而其論述之中心乃是圍繞著象數《易》學，因此諸如王弼等輩非漢朝學者，卻標幟著漢《易》發展重要階段的代表人物，亦收錄於此期間。

廖名春等人合著《周易研究史》則是採取不同的書寫進路。該書依循歷史前進的足跡，根據《易》學發展的內在邏輯，從古至今，將《易》學發展史劃分為六個時期：先秦時期、兩漢時期、魏晉隋唐時期、宋元時期、明清時期、現代《易》學時期。各章之下先介紹此時期的《易》學概說，復就該時期重要的《易》學流派或《易》學現象分節，各節之下則是列舉《易》學人物的主要學說。為進行橫向比較，茲以「兩漢《易》學」為例，作者於概說後分為「兩漢象數《易》學的崛起」、「費氏古文《易》的興盛及其影響」、「兩漢黃老派《易》學的發展」，相較於高氏《易》學史，《周易研究史》更著重《易》學宗派的形成及其代表人物。

## (二) 取材範圍問題

在討論《易》學史的取材範圍之前，實應先釐清撰寫《易》學史的作者們對於「《易》學」的認知與定義。自古以來對《易經》與《易傳》的研究，即呈現多層次、多角度、多學科的態勢。其或援以入《易》，或引《易》為援，各流派通過對《經》《傳》的解說，形成了特有的概念、範疇和命題，從而構成了一套理論體系。《易》學之範

疇以「無所不包」為喻，確為精妙，然而《易》學史之撰寫若真是「無所不包」，恐失之浮泛，難以突現《易》學研究的本體。是故，《易》學史的書寫是以歷代《周易》的注疏為主體，並以儒家體系為主流，又或者是旁及借用《周易》概念、範疇、命題以立新說的著作，將深刻影響作者的取材標準。再者，歷史上對《周易》的專門研究，總括而言，以四庫館臣「兩派」之論至為精當，但是，《易》學史之撰寫如何辨證地處理義理與象數的關係，抑或如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專務於千年來象數之學的流程與演變，概皆為取材範圍之問題。

徐芹庭《易學源流》溯及《易》學濫觴，始於燧人氏畫前之易，繼而為伏羲氏之畫卦、神農氏之易、黃帝之易、堯舜之易、夏代之易、商代之易，乃為重新沽定中國文化之起源，明揭《易經》乃學術之淵源。三代之《易》已不傳於世，今人無以見得確實的文本證據，徐氏敘史的根據是歷代文集、史籍載錄之內容，並批評時人崇洋媚外，以「眼見為實」推翻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功業，因此其撰作之初衷基於弘揚國學、復興文化，故將中國文化之起源上推至五十萬年前的燧人氏（北京原人）。此書撰作成於民國七十年，作者深感於內憂外患，故以《易》學史之書寫承擔起發揚中國文化的使命。此處，吾人更可肯定，作者的書寫意識影響其歷史敘述脈絡，從取材範圍即可見得其《易》學史研究之目的。

黃忠天教授〈易學史體例與方法的省思〉對高懷民《易》學史有以下評論：「又如高懷民《宋元明易學史》，於宋代只取理學家北宋五子與南宋朱熹《易》學、圖書派《易》學，其他《易》家付諸闕如；於明代《易》學僅取來知德，於清代《易》學只取王夫之，在明清兩代，僅各錄一人《易》學，其偏枯如此，更無法藉此書以瞭解一代《易》

學。」<sup>21</sup>黃氏所言不虛，高氏《易》學史之選材的確有偏狹、簡要之弊，但是，若能從其貫穿於三本著作中的《易》學史觀省思，則能明瞭高氏依哲思創發品評《易》學人物，在其所擇定列入史作中的人物、學說，亦因各自的學術表現有高下之分。因此，從高氏《易》學史的取材間，即可清楚地掌握作者對於歷代《易》學人物的成就評比。<sup>22</sup>

### (三) 寫作背景問題

《易》學史的書寫亦會受到作者彼時之寫作背景影響，比方說，不同時代、不同區域有不同之學術背景，這些外部環境的原因，亦將產生不同之學術問題，所以，作者撰寫《易》學史時也會有不同之寫作動機與目的，以求解決不同之疑難。以朱伯崑先生為例，1951年自清華大學畢業後，曾協助馮友蘭先生（1895-1990）編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他發現馮先生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講王弼玄學卻不談王弼《易》學，講程頤理學也不談程氏《易》學，於是便向馮先生請教。馮先生認為，《易》學哲學有一套專門的術語、範疇和體系，需要長期鑽研，方能究清。在馮先生的啟發下，為了填補哲學史的空白，朱伯崑便將中國哲學研究的重點轉向《易》學哲學的研究，將《易》學史的研究納入到哲學史的領域，開闢了經學史同哲學史相結合的研究方向。<sup>23</sup>

<sup>21</sup> 黃忠天：〈易學史體例與方法的省思〉，頁 82。

<sup>22</sup> 高懷民《宋元明易學史·自序》：「作者認為《易》學史之作不應該一概而論，如編寫辭典樣，著其姓名，述其著作，如果那樣便失去了價值標準，烏乎可？本書係以哲學思想為價值取決，以發明哲思為高尚，訓注推演者其次。由此，在《易》學興盛的時代，依據該時代中《易》學家的哲思表現，在論述中顯其高下地位，俾使讀者有正確的認識。」高懷民：《宋元明易學史》，頁 2。

<sup>23</sup> 以上請詳見鄭萬耕：〈試論朱伯崑易學哲學研究的貢獻〉，（北京：《清華大學

---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同理，每一時代的《易》學史作者亦皆有其各自的時代任務。晚近二十年來，《易》學斷代史、《易》學專題史、區域《易》學史等著作踵事增華，一方面匡補前輩學者《易》學通史之闕遺，另一方面以新的研究視域和研究方法，深化並強化《易》學的歷史研究。因此，我輩若以今日之研究標準去審視前輩學者的著作，難免落於以今非古之嫌，因為每一部《易》學史著作皆有其寫作背景與時代意義，如若不能立基於作者的當世意識，甚難有客觀的討論。

承上所論，《易》學史家必受其所處時代的思想型態、價值取向、社會意識的影響，所以，檢查每個時代對《易》學史的思想觀念與價值判斷，便成為《易》學史研究的重要課題。<sup>24</sup>換言之，後輩應討論之重點，應該是《易》學史家們是否能以《易》學的歷史研究中所形成的概念為標準，而非以當前的社會意識反映在《易》學史的論述中。

#### (四) 前學影響問題

任何人文學的研究，鮮少不與前代學術成果發生關係，且往往是

---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第20卷），頁101。

<sup>24</sup> 徐復觀：「任何思想的形成，總要受某一思想形成時所憑藉的歷史條件之影響。歷史的特殊性，即成為某一思想的特殊性。沒有這種特殊性，也許便沒有誘發某一思想的動因；而某一思想也將失掉其擔當某一時代任務的意義。」同理，「史觀」之形成亦受當時的歷史條件所影響，作者融注於歷史書寫的個人思想價值，同時亦承擔其所處時代的學術任務。請見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頁47。

前代研究的繼承與再開展，其中有批判處，亦有轉精與修正處，這種在學術上相互滋長、進步的過程，方具有實質的價值與貢獻。《易》學史的書寫亦當如此。前輩學者留下的書寫範式，是後學者立足基點，吾人是否能以時間為經，各部《易》學史著作為緯，在比較其差異之際，亦可尋繹其前後之連結，這對於未來建立新的書寫範式是具有正面的意義。

然而，《易》學史的寫作也是一代影響一代的，前一個撰寫者的思路與視野給予後來重寫《易》學史的人帶來方便，可是前輩提供的線索也給後來的重寫者暗示，無形中限定了尋覓史料、詮釋路徑的方向，後學者若陳陳相因，歷史敘述就會被限定在一個約定成俗的範圍中。因此，《易》學史所呈現的人物和事件，關乎於撰寫者的意識形態、學術背景、思路方法等各種後設的的價值和標準，後學者若是不能跳脫此限制，而是按照記憶中的《易》學史輪廓、前人留存於歷史積澱的敘說，來進行所謂的重寫《易》學史，吾人是否仍被一個制式的、熟悉的、固定的《易》學史架構所籠罩著？<sup>25</sup>

---

<sup>25</sup> 筆者之想法受葛兆光教授啟發甚深，其言：「懷特（Hayden White）說，傳統的歷史學家致力於讓自己的讀者重新熟悉過去，比較而言，福科（Michel Foucault）則努力使得過去變得讓人陌生。那些漸漸被歷史『減去』的，是否就是一旦重新被列入歷史，就會讓人對歷史『陌生』的東西？也許，我們過去的歷史敘述，已經為思想史構造了一個人們太熟悉的脈絡，使得人們已經沒有陌生和好奇的感覺了，如果要從這充滿了意識形態、學科體制的脈絡中掙脫出來，現在，是否應當打撈這些被歷史和歷史學家減去的片段，重新『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d），使我們的思想史有一個不同的脈絡？」以上請見葛兆光：《思想史的寫法——中國思想史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94。

再舉一例，鄭萬耕《易學源流》<sup>26</sup>是一本摘要式的《易》學史論著，該書雖篇幅簡薄，但內容涵蓋：《周易》的形成、從《易經》到《易傳》、漢代象數之學、玄學派《易》學的發展、兩宋《易》學的興盛、元明《易》圖學的流行、清初宋《易》的總結和漢《易》的復興，論述內容橫跨千年，具有清晰的歷史脈絡。鄭氏是朱伯崑的學生輩，也是朱氏編寫《易學哲學史》的助手，若就《易》學史書寫的傳承而言，鄭氏不可能不受朱氏之影響。

回到上文所提及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學術，《易》學史的書寫不僅有必要性，也是不能間斷的。但是，《易》學史的內涵、範圍與寫法應時常在流變當中，在承繼前人之長處，且不被既有的書寫方式所化約，後出的《易》學史是否開展其時代意義，並能提出真正具有價值的新觀點，方是後代應著墨之處。

### 三、高懷民：《先秦易學史》

高懷民（1928-）的《兩漢易學史》、《先秦易學史》和《宋元明易學史》乃其著名的《易》學史著作，初版分別於1970年、1975年及1994年問世。直至今日，論及上世紀《易》學史著述，高作仍具有不可抹滅之學術地位。高氏曾就其《易》學史寫作方向和性質，說道：

在《易》學史的寫作中，我給予最重要的人物較多的篇幅。而重要性的高低，我自己的標準是：創造者第一；注解者第二；抄來抄去堆積材料的第三。……這也是我與朱伯崑先生

---

<sup>26</sup> 鄭萬耕：《易學源流》，臺北：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

著作最大的不同處，他的著作資料豐富，但讀者不容易掌握重點，主從不清楚，也不容易掌握到發展的脈絡。他的著作很具參考價值，但我們著作的性質大不相同。<sup>27</sup>

朱作資料繁複、內容厚實，雖以各家《易》學哲學為討論主軸，仍是就文獻載述為據，思辨其學術史定位。筆者以為高氏之作更多寓個人哲思，雖述作並重，卻往往在敘述之中突出高氏個人對大《易》哲學之闡發，竭力藉由撰史以揭示《易經》於人之意義何在。因此，比較兩者之《易》學史，始能察覺個別的史觀及書寫特色。

《先秦易學史》一書專門討論先秦《易》學的演變歷程，全書共分七章，分別是：「易」名義辨釋、先秦易學的特色及其分期、符號易時期、筮術易時期、儒門易時期、道家易時期和孔老以後的先秦易學。高氏自言其撰述標準：「設身處地運思，盡量求做到以歷史上伏羲氏的時代論伏羲氏的思想，以歷史上周文王的時代論周文王的思想，以歷史上孔子的時代論孔子的思想」<sup>28</sup>，旁及當時的政治、社會、文化、信仰等各方面因素，印證《易》學於該時期的遞變理路。因此，面對先秦史料缺乏、考證不足的先天困境，高氏藉由「理推」試圖合理的解釋許多無史可證之難題，此點亦為高作饒具個人色彩之處。

由於高氏以專書討論先秦《易》學，涉及的問題甚繁，為了承續上文二部《易》學史著作討論之問題，筆者僅就較相關處，介紹其對先秦《易》學分期和先秦《易》學主流兩面向之主張。

---

<sup>27</sup> 陳韋在：〈高懷民的易學研究〉，附錄：〈高懷民老師訪問稿〉，收入賴貴三主編：《臺灣易學史》（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頁440。

<sup>28</sup> 高懷民：《先秦易學史·自序》，頁3。

## (一) 二變三階段

關於《周易》經、傳的創制，歷來大抵依循班固（32-92）《漢書·藝文志》「人更三聖，世歷三古」<sup>29</sup>的說法，《易緯》亦持相同之論，高懷民承繼此說，明確提出先秦《易》學的三階段自伏羲氏畫八卦以後，文王演《易》與重卦、作卦爻辭是第一變，孔子贊《易》與《十翼》之興是第二變，二變之分水嶺主要是以《易經》和《易傳》進行區分；三階段則是指符號《易》時期、筮術《易》時期和儒門《易》時期。茲就高書內容，整理表格如下：

第一變		第二變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天道思想時代	神道思想時代	人道思想時代
符號易時期 （始於伏羲氏 畫八卦）	筮術易時期 （始於周文王 演易）	儒門易時期 （始於孔子贊易， 為易學主流）
		道家易 （老子發明易玄學思想， 為易學支流）
		筮術易 （西周筮術易之餘脈， 為易學支流）
長達 3500 年	歷時 600 年	約 300 年

<sup>29</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前漢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四部備要·史部》，第4冊，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卷30〈藝文志〉第10，頁2。

「符號《易》時期」是《易》學的創始期，只有「☰」、「☷」、「☱」、「☲」、「☴」、「☵」、「☶」、「☳」八組卦象符號，尚未用於筮術占斷，亦無卦爻辭釋義。然高氏以為，八卦取萬物之共相而成，屬於理性思考的安排，體現先民內在哲思逐趨成熟。<sup>30</sup>「筮術《易》時期」含括西周及東周春秋時代，筮法取代卜法象徵人智進步的趨勢，文王引《易》道合人事，使《周易》從「理論的哲學」一變而成為「應用的哲學」。由《易》學發展進程而視，繼天道、神道思想以後，孔子（551 B.C.- 479 B.C.）乘時代之勢發揚人道思想，「儒門《易》時期」為先秦《易》學的總結，於此同時，亦有老子道家《易》和西周筮術《易》的餘脈彼此輝映，共締光景、續啟後局。

「二變三階段」是高懷民「外證歷史潮流，內證《易》學本身」的見解，分期之依據是《易》學的思想內容和表現形態，詳確的年代即非高氏細究之處。藉由此，可發現高氏認為《易》學本身就是哲學思想，且早於符號《易》時期的八卦創制，即起於哲學思考，文王、孔子及老子的接續力耕，是在卦爻哲理的基礎上完善《易》學的理論體系。誠然，此說與前述廖名春、朱伯崑等人的看法實為不同。

## （二）先秦《易》學的主流與支流

高懷民在此書〈自序〉中說：「先秦《易》學，是中國《易》學

<sup>30</sup> 高懷民：「能生之天地在先，所生之事物在後，乃屬理性思考的安排，可證八卦起於哲學思想。」見高懷民：《偉大的孕育》（臺北：高懷民，1999年2月），頁12。

的真精神所在。」<sup>31</sup>伏羲、文王先啟符號《易》、筮術《易》之大業，孔子繼志述事，乘時代思潮之勢而應運推行人道思想，完成《易》學的天人思想體系。高氏明言，孔子乃乘續《易》學之正統，亦將儒門《易》定為先秦《易》學第三階段的主流。

於此同時，尚有道家《易》致力於玄學思想之開展，發揚〈坤〉德以上探道本，與儒門《易》之旨趣相別，高懷民認為：「只是二人為學之重心不同，孔子著力於形下世界的經營，老子則致其全力於形上界之運思。」<sup>32</sup>二家雖路數相反，實同源於《易》，所論精神仍不出天人合一。

既然孔老同為中華文化之兩大學門，並共創第三階段之斐然成果，何以高氏將儒門《易》立為主幹，而道家《易》僅是旁支呢？筆者以為原因有二：其一，老子及先秦道家學者沒有《易》學專門著作，然孔門有《易傳》傳世。毋庸置疑，先秦《易》學最後的發展形態是純粹而精的哲學思想，乃因《易傳》確立了《易》道哲理化之學術走向。其二，高氏在書中揭示先秦《易》的四大特色：因時乘變的哲學、樸質實用的哲學、贊頌生命的哲學、鼓舞人性的哲學。此亦可謂，這是高氏的先秦《易》學史觀的論述基礎，高氏撰史的特色不僅是爬梳文獻、整理資料，更多的是以述代作，推廣其以「人」為主體的大《易》哲學。孔子的仁道思想著力於入世經營，當其納《易》學入儒門後，仁道思想終達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而《易傳》的論述重心在於指示人一條由「性命」進升道德之路徑，並以「大人」為生命終極指標，不僅擴大了仁道賅用天地的範疇，更呼應並發揚素樸的《易》學精神。

---

<sup>31</sup> 高懷民：《先秦易學史·自序》，頁2。

<sup>32</sup> 高懷民：《大易哲學論》（臺北：高懷民，1988年7月再版），頁462。

除了儒門《易》和道家《易》，尚有筮術《易》於此際相互競逐，共同奠定《易》學理、象、術、數的哲理基石，其醞釀其勢，與術數、災異之學結合，於兩漢再次創建另一個《易》學勝景，高氏以先秦乃《易》學長河之真精神實為中肯。

#### 四、朱伯崑：《易學哲學史》

朱伯崑（1923-2007）《易學哲學史》堪為上世紀最卓越之巨作。北京大學出版社於 1986 年至 1989 年曾出版過該書的上、中兩冊，全套首次由臺灣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1991 年分四冊發行。朱教授此作系統地論述先秦至清代的《易》學哲學，異於哲學史與經學史之研究，其開創性獲得高度評價。誠如作者於〈前言〉所述：

《易》學哲學有自己的特點。其哲學是依據《易》學自身的術語、範疇和命題而展開的，而這些範疇和命題又出于對《周易》占筮體例、卦爻象的變化以及卦爻辭的解釋，從而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理論思維形式；其對哲學問題的回答是通過其理論思維形式來表達的。……《易》學哲學史所研究的對象，是歷代《易》學中的理論思維並由此而形成的哲學體系發展的歷史，它是哲學史的分支，具有專題史的性質。<sup>33</sup>

研究《易》學哲學史，必須從占筮體例的解釋中，尋繹出各階段《易》學發展的哲學觀點。從經文的符號和文字、《傳》文中取象與取義之別，再到歷代專著對《易》學理論的闡發，不僅《周易》本身蘊含其

<sup>33</sup>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 1 卷（臺北：藍燈文化出版公司，1991 年 9 月），頁 2-3。

觀察世界的辯證思維，與各派思潮、不同典籍間的激盪、聯繫與影響，亦形成中國學術史上一種特別的思維體系。

《易學哲學史》第一冊的第一編，介紹「先秦時期」。第一章〈春秋戰國時代的易說〉，共分兩節，即「占筮和《周易》」、「關於《周易》的解說」。相較於龜卜，筮法重視數的演算和卦象分析，反映周人的思維能力已漸脫離純然迷信。作者認為，春秋時期的《易》說集中體現於兩處，其一乃孔門人道的教育意義；其二為天道變化的法則。第二章〈《易傳》及其哲學〉，亦分二節，即「關於《易傳》形成的年代」、「《易傳》中的哲學問題」。作者認為《十翼》為戰國後期的作品，其已從占筮用的典籍進化為治理天下和道德修養的指南，此哲理化的傾向，體現戰國時期學術發展的趨勢。

整理此書對於先秦《易》學的闡述，筆者以為作者對於此時期《易》學發展之撰史要旨，可概括為以下兩個重點：

### （一）《周易》此書之性質及哲理化

朱伯崑此著作的撰述重點在於《易》學發展之理論思維內容，因此，歷代《易》學家對《周易》的解釋，反映出各時期的學術風貌，其所關注的，乃是各流派依據《周易》提出的哲學思想及各自建立的哲學體系。至云歷朝《易》學注疏、著述，是否合乎《周易》本義，就不是朱作著墨的討論重心。

回歸《周易》本身，必須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從該書之起源、編纂以及學者的解釋，審視其性質。朱伯崑承繼朱熹「《易》為卜筮

之書」<sup>34</sup>的主張，卻更精微的區辨周人的占筮相較於殷人的龜卜，更重視數的推算和對卦象的分析，占筮形式的形成意味抽象思維能力之提升，故後人從《周易》中復又推導出哲學思想。就《周易》全書而視，卦象、卦辭和爻辭的組成，仍不脫占筮用典籍，然就符號中隱藏的邏輯思維，以及經文中對天道、人事的闡釋，在在可見春秋時期《周易》已逐步走向哲理化的路徑。

朱氏言：「戰國時期形成的《易傳》為易學哲學奠定的理論基礎。」<sup>35</sup>所以，《周易》真正從占筮書籍躍升至哲理之列，關鍵乃《易傳》的成書，若純就卦爻符號、卦爻辭而論，《周易》並非哲學著作。

異於《周易研究史》，朱伯崑更強調《易傳》並非僅出自孔門一家，其乃是薈萃春秋史官、儒家、道家、陰陽五行家等各派思想，自成體系，並且成為戰國時期一大哲學流派。例如「陰陽變易」的解《易》觀點，向來不是孔子《易》說傳統，卻是《易傳》的核心概念。據此，

<sup>34</sup> 首先必須釐清，「《易》為卜筮之書」一語早出於班固，然《漢書·儒林傳》所載：「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也。」文中所指的是秦火時，《周易》經文作為卜筮之用，並不是指《易經》起源於卜筮而非哲學思想。朱熹持論立場與班固不同，查《朱子語類》卷六十六：「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為占筮設。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朱子認為《易》自伏羲氏畫八卦即根源於卜筮之用，而哲學思想的性質乃是始於孔子作《十翼》才附加上去的，後人以義理解釋《周易》經文，往往脫離筮法，不合「《易》之本意」。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前漢書》，卷 88〈儒林傳〉第 58，頁 5。宋·黎德靖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年 12 月），卷 67〈易二·綱領上之下〉，頁 1622、1629。

<sup>35</sup>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頁 6。

---

朱氏批判道：「將《易傳》的思想皆歸之于孔子，是漢代尊孔論的偏見。」<sup>36</sup>

由此可知，對於朱伯崑而言，先秦《易》學依照時間先後和學說傾向，可分作春秋時期的占筮《易》說（《周易》符號、經文）以及戰國時期的《易傳》哲學。但《易傳》不獨闡發哲理，其中亦有不少篇幅解釋筮法，故朱氏支持以「經傳分家」的方式研究《易傳》，如此能獨立分析經、傳中不同性質的問題，亦未完全割裂經、傳間傳承之聯繫。

## （二）取象派與取義派的兩種思辨路徑

《繫辭傳》曰：「易與天地準。」<sup>37</sup>即以《周易》是對自然現象的模寫，從而引出《周易》與天地的法則乃是一致。就此命題，形成後世解《易》的兩大流派，取象派認為《周易》和筮法是從自然界的天地之形、陰陽二氣中所推導而出的；取義派則認為，《周易》和筮法彌綸天地、萬物之理，將其視為道濟天下之真理。這兩種解釋雖各有其理論思維上的侷限，然就其立論角度視之，實亦展現出兩種對於《易》學哲學的思辨方向。朱伯崑言：

在哲學史上關於世界統一性問題的探討有兩條途徑，即宇宙論和本體論的途徑。宇宙論的思維特徵是，萬物由一個原始的單一的實體演化而來，從原初的實體到天地萬物的形成，存在著時間先後的順序，萬物消滅後，又回到那個單一的實體中去。《老子》的「道生一」說，漢唐的元氣說，宋代周邵

---

<sup>36</sup>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頁 62。

<sup>37</sup> 魏·王弼等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頁 146。

兩家的宇宙論，皆屬於這一系統。雖然各家對原初實體的理解並不相同。本體論的思維特徵是，從世界的存在出發，探討萬物存在的根據及其共同的本性，以本體作為現象千變萬化的支柱，以此說明世界的統一性。王弼玄學、大乘佛教的心性學、宋明理學和心學皆屬於這一系統。其對本體的理解，雖各不相同，但都認為本體和現象不存在時間上的先後順序，以現象為本體的自身的顯現。<sup>38</sup>

本體論和宇宙論是中國哲學兩個基本的問題意識，基於思考重點之殊異，各有對《易》學名詞及概念範疇的不同解釋<sup>39</sup>，隨著歷史推移，在漫漫《易》學長河中，開展出義理派和象數派兩大詮釋系統，學者們亦因為問題意識的轉向，遂締造兩漢、晉唐、兩宋、明清各時代的《易》學風華。

當然，無論是取象說、取義說的解釋，抑或宇宙論、本體論的哲學問題，皆為各期《易》家透過對占筮體例的詮說，成一家之言。對立之二者並非僅是以矛盾、排斥的關係相互攻訐，如若公允地審視歷

---

<sup>38</sup>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臺北：藍燈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9月），第4卷，頁240。

<sup>39</sup> 杜保瑞：「將撰著法中的太極、陰陽、八卦的詮解設定為宇宙開展的階次性解說者，是為宇宙發生說的宇宙論問題意識之哲理工作，若將太極、陰陽、八卦的義理探究關注於概念義涵的關係性定位者，即成為本體概念的關係性抽象定義工作，此即本體論的哲理關懷，在這兩種不同型態的思維脈絡中，同樣是太極、陰陽、八卦的名詞，卻根本是使用在不同意義的脈絡中，前者為假設著宇宙發生說的帶著物質意義的各個存在階段歷程，後者為關懷著抽象關係義涵的個別抽象觀念範疇。」杜保瑞：〈朱伯崑易學哲學史方法論評析〉，（山東：山東大學主辦：第三屆兩岸易學研討會，1997年7月），頁5。

代《易》學流變，實可發掘，二者是相互包容、涵具，卻在彼此影響、批判、繼承和轉新的過程中，推動整體《易》學理論的發展。《周易》自身有它的本來面貌，而各時代的《易》學也反映了《易》學家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精神面貌，所以，朱伯崑提出研究《易》學史，應該將各派的《易》學及其哲學放在其所處的歷史條件下去考察；而且，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無所謂正統派的《易》學，各家學說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朱氏海納百川的治史胸襟，體現於此。

春秋戰國是古代《易》學的奠基時期，《易傳》奠定《易》學哲學的理論基礎，是此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自《易傳》始，就存在取象說和取義說，漢朝以後，象數派和義理派之爭論與補充，蔚為《易》壇千年風尚。朱伯崑此部《易》學史所研究的對象是歷代《易》學中的理論思維，其肯定先秦《易》學為整體《易》學哲學發展史之濫觴，並就《易傳》拋磚引玉的哲學問題引領後世《易》說後出轉精的貢獻，持以高度評價。

## 五、徐芹庭：《易學源流》

徐芹庭（1945-）《易學源流》1987年由國立編譯館發行初版，共分上下二冊；2008年更名為《易經源流——中國易經學史》，由中國書店發售簡體字版。該書上溯《易》學濫觴，始於燧人氏畫前之易，下及民國以來各《易》學流派，資料宏富詳實，是繼高懷民以後，另一位竭力於《易》學史書寫的臺灣學者。

《易學源流》溯及《易》學濫觴，始於燧人氏畫前之易，繼而為伏羲氏、神農氏、黃帝、堯舜、夏代、商代，乃為重新沽定中國文化之起源，明揭《易經》乃學術之淵源。三代之《易》已不傳於世，今

人無以見得確實的文本證據，徐氏敘史的根據是歷代文集、史籍載錄之內容，並批評時人崇洋媚外，以「眼見為實」推翻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功業，因此其撰作之初衷基於弘揚國學、復興文化，故將中國文化之起源上推至五十萬年前的燧人氏（北京原人）。此書撰作初成於1981年（序言），作者深感於內憂外患，故以《易》學史之書寫承擔起發揚中國文化的使命。此處，吾人更可肯定，徐氏的書寫意識影響其歷史敘述脈絡，從取材範圍即可見得其《易》學史研究之目的。

此作對於先秦《易》學之論述，主要集中於第二章〈易學濫觴〉和第三章〈周易之完成與周代之易學〉。〈易學濫觴〉又分作七節，即：「燧人氏畫前之易」、「伏羲氏之畫卦」、「神農氏之易」、「黃帝之易」、「堯舜之易」、「夏代之易」、「商代之易」。〈周易之完成與周代之易學〉分為十五節，即：「周易卦爻辭完成於西周」、「周代兼用卜筮，西周卜重於筮，東周筮重於卜」、「周易理氣象數之精義發揮於春秋時代」、「十翼之先河」、「孔子與十翼」、「孔子弟子之易學」、「子思之易學」、「孟子之易學」、「荀子之易學」、「孔子再傳弟子以後之易學」、「管子之易學」、「老子之易學」、「莊子之易學」、「呂氏春秋之易學」、「其餘各家之易學」。純就章節標題而論，此作之內容甚為龐雜，且作者援引之文獻資料旁涉考古學、人類學、地質學等，亦可見其企圖以《易》學史囊括中華文化之用心，以下茲就此議題分兩面向討論。

### （一）易學起源上溯至畫前之易

異於前述幾部《易》學史，《易學源流》將《易》之創制上推至中華文明初萌的階段，也就是距今四、五十萬年前的燧人氏時代。徐

芹庭認為，北京原人能鑽木取火、教人熟食，並群居祭祖、敬老扶幼，實已燃起倫理思想之火苗。而且，徐氏認為易理存於天地間，不待作《易》，已具乎天地之間，因此，論《易》之起源當溯乎畫前之易。

此說有幾點值得吾人注意，首先，《易經》乃五經之原，將《易》之起源上溯至燧人氏時代，乃是欲弘揚中華文化為古文明的先鋒，顯見徐氏撰述時的歷史背景和寫作動機。其次，先秦距今最悠遠，可證之資料相對稀少，尤其四、五十萬年前的學術事實更難有文獻佐證，是故，徐氏必須為其立論尋繹合理之研究方法，其言：

知識之來源有二，一曰經驗，一曰推理。……經驗者切身所親見，親身所履歷而獲得之知識也。推理者以自己理性之思惟，推論而得者也。……先民之經驗與知識，代代相傳，吾人雖未親見，然已成吾人之知識，與歷史之史料，推理可知；且由考古學，古生物學，人類學，及從地下挖掘物經科學分析之旁證中，亦可推知其正確。職是之故，吾人由此可獲知千年萬年以前之學術與文化。……蓋學思並重，推理與經驗兼顧。乃吾人求知不二之法門。亦本篇論述論文之方法。<sup>40</sup>

基於此，徐氏採行經驗、實驗、推理兼顧，重新推溯畫前之《易》與文化發端，而且，此論文之方法並貫徹於其先秦《易》學中。例如：伏羲畫卦，始作書契，雖無有力證據確定重卦亦為其功，但亦未能否定之，徐氏就此即援引二十餘種資料，著錄眾說以呈現學界多方之見，及其個人推論傾向。同樣的，夏易為《連山》，商易為《歸藏》，且二者確實曾存在，並為《周易》之淵源，徐氏亦廣羅文獻之蛛絲馬跡，從而提出其存疑與證驗之處。

<sup>40</sup> 徐芹庭：《易學源流（上冊）》，頁4。

再者，徐氏對先秦《易》學之分章為〈易學濫觴〉和〈周易之完成與周代之易學〉，實言之，其以年代進行劃分，也就是第二章為周代之前的《易》學發展，第三章專論春秋、戰國時期。然就《周易》一書之撰作，前者乃《易》之符號創制，後者則標誌著《易》學正式走向經傳創作，並綿延數千年，成為歷朝文人經學研究的重心。此章節劃分之用意，筆者以為正呼應徐氏於〈自序〉中所言，欲以《易》學重燃中華文化之薪傳。

## （二）恢復文化正統之易學史觀

徐芹庭撰寫《易》學史與前三部著作的另外一項殊異處，乃在於前述作者將《易》學視為一門專門學科，而《易》學史類似於專題史之研究。然而，徐氏則是將《易》學目為學術之原，《易》學發展歷程實亦代表中華文化之歷史演進，其慷慨激昂的書寫動機，將撰史工作提升至振衰起敝之文人抱負。所以，徐氏之《易》學史觀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中心精神，亦即恢復文化正統。

除了將易學起源上溯至畫前之易，在〈周易之完成與周代之易學〉一章，徐氏更力圖維護孔子與《十翼》的關係，對於歐陽修、錢玄同、顧頡剛、李鏡池、馮友蘭、錢穆、本田成之等人的質疑，逐一糾謬、辨清。如實言，面對上揭疑惑，徐氏卻先預設立場，也就是上述諸人「欲打倒孔子，打倒吾國文化」<sup>41</sup>，但若換個角度付思，徐氏實已肯定孔子的文化地位，以及孔門與《十翼》乃周代《易》學傳承之主流，亦為總結先秦《易》學之代表作。然而，綜觀該篇章，作者並未深入

---

<sup>41</sup> 徐芹庭：《易學源流（上冊）》，頁 206。

《十翼》細究各《傳》文本的哲思內涵，僅是羅列、釐析歷朝述及孔子與《易傳》之資料，從而加強佐證《十翼》為孔子所傳，此乃《易學源流》迥異於其他著作之處。

即便如此，徐氏之書寫並未違悖其於〈自序〉所言之論述立場，站在學術角度審視，其大量蒐集、徵引論及先秦《易》學的相關紙本文獻與跨領域素材，並進行有機的刪汰、類歸與思辯，單就《易》學史之資料整理工作，已有突出的貢獻。

## 六、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周易研究史》

《周易研究史》是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三位學者師從金景芳教授學《易》的成果，此書所引用的資料至1989年底為止，《易》學的發展亦只書寫到1989年。全書共468頁，約略估計為三十三萬字，除了〈緒論〉，其他七章的章節名稱為：〈先秦易學〉、〈兩漢易學〉、〈魏晉隋唐易學〉、〈宋元易學(上)〉、〈宋元易學(下)〉、〈明清易學〉、〈現代易學〉，各章節的篇幅大抵相當。作者自言，此書由三人合力完成，其中廖名春撰寫〈緒論〉、〈第一章〉、〈第六章〉、〈第七章〉；康學偉負責〈第二章〉、〈第三章〉；梁韋弦則書寫〈第四章〉、〈第五章〉。最末，再由廖名春教授統整完稿。本文所欲討論之先秦《易》學範疇，即是由廖教授所著手之部分。

先秦時期流傳迄今的文獻資料見於典籍中的《易》說和《易》學專著，後世《易》學研究的兩大派別——卜筮派和義理派，皆肇始於此一階段。作者認為，先秦時代的《易》學主流是義理《易》說對卜筮《易》說的取代，此章後文的開展，亦循此論進行敘述。

第一章〈先秦易學〉共分為三節，即：先秦《易》學概說、先秦

時期的各家《易》說、由傳而經的《易傳》。作者歸納此期占筮《易》說有三個特點，就是：變卦、辭占以及象占，並肯定其說解構成後世象數《易》學發展的重點。復次，對於此期的義理《易》說，作者以時代進行劃分，分作春秋時期之疑占說、引證說、以德代占說；戰國時期的荀子《易》說、《莊子》《易》說、《呂氏春秋》《易》說、《戰國策》《易》說。最後，作者以將近一半的篇幅討論今本《易傳》，內容涵蓋《易傳》之時代、作者、治《易》原則、研究方法和哲學思想。

綜觀此書對於先秦《易》學的爬梳，筆者以為作者對於此時期《易》學發展之撰史要旨，可概括為以下兩個面向：

### （一）義理《易》學為先秦《易》學的主流

先秦《易》學乃後世象數、義理之濫觴，今存此時期的研究材料，主要可見史籍中的占筮紀錄，以及《易傳》為主的孔門《易》學著述。作者將此期《易》學發展劃分為兩大階段，其一是春秋時期，乃《易》學從占筮之用轉向哲理認識的重要階段，孔子開創儒門解《易》為重大突破；其二是戰國時期，諸子吸收、援引或應用《易》學，《周易》不再只是一家之學，而是能以富有生命力的姿態與各家學說激盪、結合。

從卜筮《易》進化到義理《易》之研究，最顯著之轉變即是孔子「以德代占」的治《易》態度。孔子跳脫前人「參以占筮、決定諸疑」<sup>42</sup>的《易》學傾向，通過掌握《易》理以達無大過的方式，提升《易》

<sup>42</sup> 《周易研究史》：「《周易》原為卜筮之書，儘管其中包含有深刻的社會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但孔子之前人們基本上是以它作為判斷吉凶的工具，這從《周禮》、《左傳》、《國語》等史籍的記載中可以清楚看出。從義理的角度治《易》，

學的哲理價值。是故，作者言：「以德代占是義理《易》學的基本取向，也是《易》學研究哲理化的標誌。」<sup>43</sup>

## （二）孔門《易》學居於承上啟下之地位

孔子《易》學除了奠定後世《易》學走向哲理研究的方向，《易傳》的撰寫及完成，亦為此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重量級著作。《周易研究史》乃就《易傳》七種十篇，逐一考察各篇的時代及其與孔子的關係，當然，若以整部《易傳》皆出自孔子一人之手，著實有失公允，然若將其與孔門學術決然切割，亦太過武斷。基於此，廖名春提出：

我們從司馬遷說，認為《易傳》的《彖》、《象》、《繫辭》、《說卦》、《文言》為孔子所作，並不是說它們都像今人著作一樣，一字一句都係孔子所寫。李零認為「古書從思想醞釀，到口授筆錄，到整齊章句，到分篇定名，到結集成書，是一個長過程。它是在學派內部的傳習過程中經眾人之手陸續完成，往往因所聞所錄各異，加以整理方式不同，形成各種傳本，有時還附以各種參考資料和心得體會，老師的東西和學生的東西並不能分得那麼清楚，所以我們不能以今天的著作體例去衡量古書。」此說非常合乎《易傳》的實際。……《易傳》大部分為孔子所作，基本上屬於孔子思想，研究《易傳》的易學觀，也就是研究孔子的易學觀。<sup>44</sup>

---

這是易學史上一次歷史性轉變。這一轉變開始於《易傳》，發軔於孔子。」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周易研究史》，頁 54。

<sup>43</sup> 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周易研究史》，頁 26。

<sup>44</sup> 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周易研究史》，頁 51-54。

自宋代疑經至民國疑古學風，學者已就《易傳》非孔子獨立完成提出多項辯證，廖名春並未否定前學的觀點，但其乃是從整體《易》學流變的角度，鳥瞰此學術史之問題。孔子及其後學致力於《周易》哲理之闡發，並集結《易傳》十篇，從此，《易》學不啻是巫卜之流，而是晉升至學術殿堂，並深刻影響中國學術數千年。這項工程，是孔門眾人踵事增華的成果，然深究《易傳》之核心思想，仍緊扣於孔子的《易》學觀。

《周易研究史》對於先秦《易》學之撰述，主要是肯定孔門《易傳》奠定義理《易》學之研究基石。廖名春並分析《荀子》、《莊子》、《呂氏春秋》、《戰國策》等書中的《易》說，發現其或多或少受孔子《易》學的影響，概皆自義理的角度用《易》、解《易》，這亦呈現戰國諸子的治《易》學風普遍重於義理。

廖名春於〈緒論〉提及：「《易》學史是一門研究《易》學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學問。它應該包括《易》學文獻學、《易》學哲學史、《易》學人物史、應用《易》學史。……這四個方面誰是研究的主要對象呢？我們認為應該是《易》學文獻學和《易》學哲學，它們是《易》學的主體，自然也應該是《易》學史研究的重點。」<sup>45</sup>單就此書中〈先秦易學〉一章，作者蒐羅考究先秦各家《易》說，並從整體學術史的視野切入，掘發此時期《易》學發展的主流——孔門義理《易》學，就撰作宗旨和實際書寫兩層次而視，是前後呼應的。

---

<sup>45</sup> 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周易研究史》，頁3。

## 七、結語

綜上所述，總結本文之觀察與反思如下：

第一，先秦距今年代久遠，許多書面資料已付之闕如，實難以搜尋，在地下考古資料未有突破性發現之前，僅能就目前傳世文獻和已公布之其他領域材料，試圖建構先秦歷史及《易》學的圖像。此即為本文所述四部《易》學史著作面臨的艱鉅挑戰，因此，作者群面對無法以文獻資料說明的部分，或略而不談，或以旁徵博引的方式推想，期待新的材料或方法問世，解決此書寫困境。

第二、《易》學史的書寫仍應回歸至文本探究，因此，對於《周易》創制及作者的問題，乃是主要的核心。大抵而言，上述四家皆依循傳統「人更三世」之說法，推崇伏羲氏、周文王、周公及孔子發明《易》義的貢獻。然而，對於細部功業之判定，例如：重卦為伏羲氏抑或周代完成之爭論，則因為難有強而有力之證據，實難斷定，故諸說仍存在歧見。

第三、「先秦《易》學」咸指漢代以前的《易》學發展，然此時期不啻距今久矣，且其跨越的年代甚廣，實難一概以同一時期視之。因此，四部《易》學史之書寫有採朝代區分，亦有以《經》、《傳》之作成劃分，也有以《易》之發展性質作階段性分別。作者們分章分節的殊異，亦各自透顯其如何以較為讀者接受之方式，進行議題的類歸，便於順利闡述其脈絡；而議題之選擇，更突顯該部《易》學史所側重的性質。

第四、學術史的傳承必涉及學術正統及非正統的問題，學者對於先秦《易》學之沿革，未脫伏羲氏、周文王和周公、孔子和其門弟子

之固有說法。然而，自宋代疑經風氣煽起，孔子與《十翼》的關係已非牢不可破；此外，《易》學亦非專擅於儒家，道家與《易》近來亦為學界討論議題。是故，撰史者如何以更包容、圓滿的氣度處理《易》學正統與非正統的爭議，先秦《易》學僅是發端，在後世悠悠《易》學長河中，如何給予各家流派一個適宜中允的學術定位，方為《易》學史書寫最大的挑戰。

第五、《易》學史之書寫本非資料堆砌的歷時性紀錄，閱讀《易》學史的迷人之處，在於作者們融注個人《易》學見解及書寫立場的特別史觀，如此以述代作的寫作方式，才能顯現不同《易》學史的獨特之處。所以，吾人看待各部《易》學史應審視作者貫穿於著作中的中心思想與主要立場，不應就各自立場殊異而駁難其非，反而應站在作者撰述時的寫作背景和研究動機，思索其如此書寫之原因，並以此為準，討論其史觀是否合乎今日的學術視野。

第六、《易》學之發展代代相續，《易》學史的書寫亦為動態進程，深信在巨人的肩膀上，後學者將取其瑜、棄其瑕，在不斷改進與增益的過程中，賡續不輟，新時代的《易》學史書寫將呈現另一時代之風華。

## 引用書目

### 一、古籍

1.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前漢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
2. 魏·王弼等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
3. 宋·黎德靖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
4. 清·永瑆、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 二、專書 / 專書論文

1. 戶田豐三郎：《易經注釋史綱》，東京，風間書房，1968年。
2. 今東光：《易學史》，東京：紀元書房，1966年。
3.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1卷，臺北：藍燈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
4.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4卷，臺北：藍燈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
5. 徐芹庭：《易學源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年。
6. 徐芹庭：《易圖源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93年。
7. 徐芹庭：《易圖源流——中國易經圖書學史》，北京：中國書店，2007年。
8. 徐芹庭：《易經源流——中國易經學史》，北京：中國書店，2008年。

9.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
10. 高懷民：《大易哲學論》，臺北：高懷民，1988年。
11. 高懷民：《偉大的孕育》，臺北：高懷民，1999年。
12. 高懷民：《先秦易學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13.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14. 高懷民：《宋元明易學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15.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1年。
16. 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臺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年。
17. 葛兆光：《思想史的寫法——中國思想史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18. 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周易研究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
19. 鄭萬耕：《易學源流》，臺北：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
20. 賴貴三主編：《臺灣易學史》，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
21. 英·沃爾什（W. H. Walsh）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哲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 三、學位論文

1. 王詩評：《高懷民教授《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6月。

#### 四、期刊論文

1. 杜保瑞：〈朱伯崑易學哲學史方法論評析〉，山東：山東大學主辦：第三屆兩岸易學研討會，1997年7月，頁1-8。
2. 李威熊：〈如何編寫一部理想的經學史〉，臺北：《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卷第3期，1991年9月，頁140-143。
3. 林忠軍：〈近六十年來中國大陸易學研究述評〉，新北：《哲學與文化》，第42卷第12期，2015年12月，頁19-35。
4. 林慶彰：〈經學史研究的基本認識〉，臺北：《國文天地》，第3卷第6期，1987年11月，頁60-63。
5. 程元敏、朱鼎宗、李威熊、莊雅州：〈現行經學史及其相關問題〉，臺北：《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卷第3期，1991年9月，頁125-153。
6. 黃忠天：〈易學史體例與方法的省思〉，高雄：《經學研究集刊》，第19期，2015年11月，頁77-90。
7. 鄭萬耕：〈試論朱伯崑易學哲學研究的貢獻〉，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第20卷，2005年2月，頁101-106。